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一月三日　　·每份售七千元·

第三卷　第十九期

專論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情形　儲安平

知識生活的偏向　劉緒貽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李孝友

印度的道路（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論商賈（生活與文化）　袁方

觀察通信

蘇北實地視察錄（蘇北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台灣總有一天（台灣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人物及事業）　余才友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觀察文摘）　朱光潛

讀者投書

政府改進爲一切之前題

又一個被鬥爭者的陳訴

上海監獄

關於「美國的機器」

沒有錢結婚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松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蕭錕齒　蕭乾　嚴劍章

撰稿人

讀者投書

重要啟事

本社業務日繁，原址不敷應用，自即日起，分在吳淞路及北四川路兩地辦公。以後各界來函，請改投「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為荷。

直接定閱·優待十天

從本期起，我們仍須增售一千元，以維收支平衡；每份改售七千元。但為優待直接定戶起見，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定閱的，仍照原價（見第三頁上右角價目）；外埠以郵戳為憑。

合訂本在一月十五日以前，亦仍照原價發售，每册六萬五千元；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册改售八萬元。

政府改進為一切之前題

編者先生：今天打開大公報一看，有兩件新聞頗值得注意，同時也令人發生感慨！第一件，司徒雷登大使在北平發表談話，最後強調中國目前局勢之解決，必須第三方面的力量：（一）政府的改進，（二）人民的覺醒，（三）外來的協助。第二件，成都電報：蓉市最敢說話的參議員宦鐵予突然失蹤。這兩件事連起來，甚有意味，也可以表明現階段中國的政情。我個人以為司徒大使所指出的三點，不能並列，必須把第一點——政府的改進——做為其餘兩點的前題，才是關鍵所在。大家知道，中國時局所糟到如此，人民中的確已有覺醒的自由份子，可是高高在上者對他們總懷着一種敵意，使他們不能形成力量，這是事實。美國何嘗不想借款？但我們老是貪污與無能，人家眼看着拿錢投到水裏面，那就要多所考慮了。宦鐵予的大名，不但震動了成都，就是四川全省以及全國都已知道這是一個真正能代表民衆的好漢，為什麼會失蹤呢？這其中就有文章了。前些日子，有一位前輩先生曾有這樣的感慨：現在的中國，有心人既不能做甘地，又不能做華萊士。這兩句話，真可說「旨哉言乎」，確能搔着癢處。現在據說已經行憲了，我們拭目以看政府的改進的程度如何？宦鐵予一案的結果如何？

周一志　十二月廿九日　上海

又一個被鬥爭者的陳訴

編輯先生：拜讀貴刊三卷八期讀者投書欄，鄙人對貴刊之公正，無任欽仰。現在政府確有甚多不滿人意者，常見京滬一帶許多報紙刊物大加攻訐，實屬應當。但對中共的「解放區」則避而不談，殊失公正。不悉是不敢言，不欲言，抑立場關係不便言？人心之壞，臻於斯極！鄙人係山東平原縣馬腰務鎮人，於三十年離家就學於安徽阜陽國立廿二中，旋以經濟及環境關係加入軍旅，隨軍抗日，勝利後編餘。深夜捫心，對國家雖無大功，亦已流過血汗，方冀同家團聚，突於去年七月九日，接舍弟自濟南來信，驚悉舍下遭共軍鬥爭，家徒四壁。除鄙人老婆被共軍抓去，強迫加入婦女會外，全家老小於卅四年陰歷十月間星夜捨命逃奔濟南，一家在濟缺衣乏食，終日以淚洗面，苦不堪言。共軍鬥爭的理由：一因舍下是「資產階級」（家中有薄田卅五畝）。二因家嚴曾於戰前在政府當過小職員，共軍指為「國特」。三因鄙人在外作事，共軍曾見往昔寄家之信，因之更加痛恨。四因本縣共軍區長邱某係一無賴刁棍，舍下早有嫌怨，藉以報復。舍弟來信言，若非夜間逃出，全家必遭活埋，並稱：敝縣被鬥爭者幾佔半數，因言語不慎或被指為「國特」而被刀砍活埋者日有所聞！人人危懼，朝不保夕！家鄉已成人間地獄等語。鄙人聞訊痛苦萬狀！曾在西安華北新聞報登出舍弟來信，以向社會人士控訴，並曾投書西安書報精華社，詎料該社未予刊出，不悉中共及其同情者所稱的「自由」，「民主」，「解放」，作何解釋？現在舍下的地被瓜分，房屋被扒，老少逃亡，言之悲痛欲死，素仰貴刊立論公正，主持正義，為特哀懇編輯先生賜登貴刊一角，永世感戴不忘。

郭少川　十一月七日　陝西韓城

上海監獄

編者先生：上海監獄係前英租界工部局監獄，其時外人為主，國人為奴，一切設施，悉與其殖民地政策配合，同一監獄，有中西畛域，設備亦殊。監禁外人，儘可優待，國人則另以獸欄式小室囚禁，制規嚴密，動輒得咎，稍有不遜，鞭棍隨之。同屬人類，同為守法，而待遇懸殊如此。

勝利以還，接收監獄，兩年於茲。整頓限於經費，原有設備，漸難維持，大有每況愈下之勢。際此國步維艱，自難苛求。惟人犯待遇，仍有差等，不特中外人犯待遇之各別，抑且本監職員亦不若外籍犯之享受。爰就該監中外人犯待遇懸殊情形，陳述於后：

一、外籍犯禁於感化院，三人二人一人一室不等，內有桌凳床燈等設備。其他人犯，皆無床舖，更無桌椅，三人一室，室大不如外籍犯室六分之一，更[illegible]電燈裝置可隨意開關。尤有甚者，值此需電時期，本監職員嚴禁使用電爐，而外籍囚犯，居然任意裝置，燒柴取暖。

二、例假日及非辦公時間，人犯一律收封（鎖於室內），其他時間，除操作者外，整日禁於一室。外籍犯賦與飽食終日（有配給麵包），無所事事，如與普通人犯同等待遇，自應不予開封。然而非特例外開封，且在例假日及普通犯收封時，外籍犯仍逍遙室外，怪叫噓聲。甚者隨意離去監房（感化院），乘興所之，看守尾隨其後，來去匆匆，儼若衛差。無殊「洋大人」之保鑣。

三、家屬之接見，普通犯均依法定時間在法定場所為之。外籍犯不然，另於鑰匙間（全監鑰匙匯集之處，武器庫亦在其旁，為警衛禁地。）接見，每月次數倍於普通犯，每次在一小時以上，較之普通犯每次五，六分鐘，大相徑庭。外籍犯且可攜倚言歡，談笑自若（與普通犯之隔窗對立，自有不同。）吸煙不禁，人犯家屬傳遞香煙，授受鈔幣，毫無忌憚。

張明琴　十二月十日

關於「美國的機器」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卷十期刊載史超禮先生的「美國的機器」一文，發現幾點毛病。

（一）關於工作母機的意義：史先生說『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這是對的，但他接下去說『這等於要燒飯非要鍋灶；要成衣非要針線；要種田非要犂鉏一樣。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為大量工業生產的話，那麼鍋灶、針線、犂鉏就相當於他們的工作母機』。這幾個例，頗有檢討的必要。因為如照這樣解釋，反而把『工作母機』的原意失去了。工作母機實際是製造各種機器的機器，是最基本的機器。譬如製造紡織機，許多另件都離不了車、刨、鑽、銑、磨等基本工作，所以有了工作母機就可製造紡織機，因此我們可以說車床、刨床、鑽床等等是紡織機的『工作母機』。『工作母機』的『母』字，含義甚好，譬如母親，生下子女來，母親是人，子女亦是人。工作母機是機器，製造出來的亦是機器。（下接十九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 平寄六萬五千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九萬元 航掛12萬五千元
半年(廿四期) 平寄十三萬元 掛號二十萬元 航平十八萬元 航掛廿五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貞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九期
三十七年一月三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李孝友：中央大學學生
蕭紹端：印度全印廣播公司
袁　方：清華大學教員
余才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情形

儲安平

最近英商字林西報、美商大美晚報和上海報業公會，因爲白報紙配額問題，引起嚴重糾紛；上海報業公會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召開的第四十二次會員大會決定第四季白報紙配額時，認爲字林西報和大美晚報在紙張篇幅上，未能遵守公會公約，故將字林西報的白報紙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九十，即自九千四百十元美金減爲九百四十一元美金；大美晚報的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五十，即自八千四百五十八元美金減爲四千二百二十九元美金。被處罰的兩報連日以極大的首頁新聞地位及社評地位，向報業公會提出抗議。在性質上，這本來是一個同業公會之間的內部問題，但在趨勢上，幾乎變成爲一個涉及國際性質的外交問題。輸管處主任委員張公權于十二月二十日致函大美晚報，謂白報紙配給額之最後決定權，在輸管處而不在報業公會，並謂該處對於字林西報及大美晚報之配額問題，將有公平之解決；遂使情形略趨緩和。我們現在願就一年來白報紙配給情形，陳述意見，希望政府能使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合理公平。

白報紙的價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極其平穩。從三十五年年底起，開始波動：經常在二萬五千元一令的白報紙，五萬、十萬、十五萬、躍漲不已。在白報紙曾經最高漲到一百五十萬元一令的今天來看，十五萬一令的價格，不啻是黃金好夢，令人戀憶不止。但在三十六年二月間，一般文化事業的經營者，對於這種漲無止境的白報紙價格，已都惶惶不安。在這時候，政府決定以國家的力量來扶助文化事業，遂有白報紙配給制度的施行：在政府每三個月一次的進口限額中，以一定的數目，配給文化界出版界，使得到配額的出版機構，可以向政府購買外匯，訂購報紙。其後白報紙的價格，一日千里，二十萬、三十萬、五十萬、八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萬，一直到最近最高的一百五十萬(一令)，白報紙的價格越漲，白報紙配額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字林西報在這次的配額爭端中所說的，假如他們不能獲得他們原有的配額，他們勢必被迫停刊；這話既非誇大，也非威脅，在實際上確有可能。事實上，今日中國的出版界，無論是報業、書業、或雜誌業，無不爲這高漲的紙價壓得透不過氣來。以本刊論，我們在三十五年九月創刊時，紙價祗有二萬五千元一令，現在漲到一百五十萬元左右，約漲六十倍之多，但是我們創刊時的售價，祗有五百元一份，即以本期增售七千元一份的售價言，本刊的售價亦僅上漲十四倍。這個在同一時期內，紙價已漲六十倍，售價祗漲十四倍，都是確確實實的事實，而其對比的強烈，則令人看後不禁心弦震盪。除非報紙、書籍、或者雜誌，它的銷路或者它的售價能與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否則終將血乾汗盡，垮了完事。但是報紙、書籍、雜誌，無論是銷路或者售價，要和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均不可能。普遍的貧窮使報紙、書籍、雜誌的銷路越來越呆滯，一切出版物的銷路，不僅無增加之望，反有下跌的趨勢。經營門市的人都在叫苦：看書的人多，買書的人少！肚子都吃不飽，還有什麼錢買書呢？支出的增加，使出版品的售價必須增加，售價的增加使買得起的人越來越少，而銷路越少則售價更越須增加；如此循環，出版業的前途便越來越黯淡消沉。所以現在大家

都希望獲得白報紙的配額，藉以減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撐持，以維護文化事業的生存。

過去一年中政府所實行的白報紙配額制度，我們認爲其中最可批評的地方，卽上海一地在全部配額中所佔的比率，實在太大。據我們所獲得的材料，卽以最近這一季，卽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三十七年一月）的白報紙配額分配情形說：第四季的配額總額是二百五十餘萬美元，但上海一地的書業分到八十餘萬美元，約佔總額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報業分到六十餘萬美元，約佔總額的四分之一；國民黨黨辦報紙刊物分到三十五萬餘美元，約佔總額的八分之一弱，上海的紙商業分到二十餘萬美元，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國各地的非國民黨黨營報業，包括北平、天津、漢口、廣州等地，一共亦不過分到三十餘萬美元。易言之，在全國的白報紙配額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幾乎佔到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時，平津同業大都表示上海書報業享受的配紙數額太多。在同一時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李俊龍副部長視察河南一帶時，當地的同業也一致呼籲，要求享受白報紙的配額。這一年來，內地報業因受紙價的重壓，被迫縮小開數甚或停刊者，時有所聞；西安紙荒的嚴重，幾乎使西安全體報業解體。再以上海報業的分配情形而論，卽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據我們獲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左：

新聞報	一四七、五四四元（美金）	大衆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申報	九一、五七七元	自由論壇報（英文）	九、一七二元
大公報	八三、五三三元	中華時報	七、九一一元
正言報	二九、一〇〇元	金融日報	七、〇六四元
東南日報	二八、七〇〇元	立報	五、九三五元
和平日報	二六、二六二元	大美晚報（英文）	四、二二九元
前綫日報	二二、一五七元	俄文日報	二、七六四元
益世報	二二、一五七元	字林西報（英文）	九四一元
商報	二二、一五七元	英文回輪日報	四〇〇元
大陸報（英文）	二〇、九一九元	鐵報（小報）	五、九六〇元
華美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飛報（小報）	四、三〇五元
新夜報	一〇、二二三元	小日報（小報）	二、五〇〇元
時事新報（晚刊）	一〇、二二三元	力報（小報）	二、五〇〇元
大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羅賓漢報（小報）	二、一〇〇元
新民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誠報（小報）	一、六〇〇元	東方日報（小報）	九五〇元
活報（小報）	一、五〇〇元	辛報（小報）	九二〇元
風報（小報）	一、五〇〇元		

右列數字可以幫助我們明瞭目前上海報業白報紙配額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個國家爲單位來看，我們不能同意這種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漢口、開封、西安、蘭州、迪化、成都、重慶、貴陽、昆明、桂林、長沙、南昌、廣州、福州、瀋陽等地，各有其優秀的報紙，在各區域的地理崗位上，負其傳播文化的使命，我們絕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國各地。我們認爲這種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應以全國爲單位，就各地報業與出版業的需要與貢獻，衡量實際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將感情完全側重於京畿附近的一二個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過去一年中，白報紙的配額情形，物議甚多。最通常的兩個毛病：第一個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過其實際的需要，少的少到遠不敷其實際的需要；第二個是分到白報紙配額的人，當他利用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時，不一定能符合國家所以要分給他白報紙配額的本意。國家所以要給各報館各書店各出版機構白報紙的配額，其目的乃在減輕報業、書業、出版業在用紙方面的負担，亦卽間接減輕讀者的負担，用以傳播有益於社會的文化及思想。白報紙配額的目的，並非借此以補貼各受配對象的龐大而近於浪費的行政開支，或借此以肥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私囊。白報紙的配額不是一種分贓、救濟、或補貼，受配對象應當將所配到的白報紙，用之於印刷報紙或出版書籍，不得將配到的白報紙作爲受配對象在業務上的一種資金，發生買賣行爲，以此週轉或以此贏利。但一年以來，實際情形與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無論報業或書業，有些人家所分到的配額，是否不超出其實際需要，不免令人懷疑。在報業方面，據我們所知，曾有人提議在報業公會內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調查各報的實際發行額，用以決定該報所得到的白報紙配額是否超過其實際需要，但這個提議始終行不通，因爲大多數的報紙都不願公開其實際發行數。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密勒氏評論週報第一篇社論中就有這樣的敘述：上海每一家報紙都虛報他們的發行額，用誇大的發行額以便招攬廣告。密勒氏評論週報甚至懷疑，上海有些報紙，爲了要求配紙，誇大他們的發行數。密勒氏評論週報的記者說：他們曾經聽說，有一家報紙自稱日銷六萬份，但報業公會於分配配額時，知道其數不確，所以打了一個對折，祇給了那家報紙相當於日銷三萬份的配額。那一家報紙發行人，一方面向

報業公會抗議其議決的不合理，」方面心裏卻十分高興，因爲實際上這家報紙僅僅日銷二萬份，（密勒氏評論週報一〇八卷四期一〇八頁）。張君勱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他們所需要的白報紙是一家半官方報館分給他們的。一般人都有一種共同的印象，即單就上海一地言，白報紙的配額並不是完全公平的。這種不公平的情形同樣見之書業方面。我們甚至又可以說，書業分配白報紙的情形，比報業更壞。報業每一次決定配額後，其配額清單雖不向社會公開，但在報業公會的會員之間，是公開的，各會員還有機會知道每一家所得到的配額。書業公會則除了理事們之外，其他會員很少知道每一次白報紙配額的實際情形；一切都操之於少數理事們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頭要求書業公會公開白報紙配給的清單，但被詢問的人則要求巴金先生用書面提出來。其後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萬有書店三家聯名正式致函書業公會，請求公開白報紙配給賬目，但書業公會迄無隻字答復。有許多人都懷疑書業公會的理事會員，利用其自身爲「理事」，都能分得相當多的白報紙配額。這種懷疑有無根據，祇須書業公會一方面公佈其理事名單，一方面公佈其過去各次配紙的清單，便可證明。在書業中，有許多的的確確在認眞出版有價值的書的出版業，他們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非常微小，遠不敷其實際需要，以致有許多稿子，業已排好，打好紙型，而沒有白報紙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書籍的書店，卻可以獲得爲數甚大的白報紙配額。又有些書店，白報紙配額雖然分到不少，但極少出書，就靠分到的白報紙「坐吃」。所以現在上海有一個新名字，叫「吃白報紙」。前幾天，上海新民晚報上有一段新聞，說有一家書店，要抛出白報紙，價達二百億之鉅。這個消息假如是事實，則大可證明書業中的確有人配到了白報紙而並不用以出版書籍。政府以國家外匯購進的白報紙，配給出版業，原是鼓勵並幫助出版書籍者，而受配者卻用以作爲他們的業務資金，移作非與直接付印有關之用；這實大違政府施行白報紙配給制之原意。更進一步說，我們認爲白報紙的利用，應以有益於社會的文化事業爲限。我們絕不同意以國家艱難的外匯購進的白報紙，浪費在印刷大篇幅的商業廣告或娛樂廣告，或者印刷色情誨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書業公會，一方面要求書業公會公開配額清單，一方面曾質問書業公會爲什麼出版黃色色情書籍的書店卻可獲得極大的白報紙配額。我們認爲這種質問極其重要。白報紙的配給，既要公平，亦須合理。一切分配超過了其實際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報紙去印刷無益於社會文化的圖書，或者乾脆分到報紙而不出版書籍，「坐吃白報紙」，這一切情形我們都認爲是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的情形，不僅浪費着國家的外匯，並且間接剝削了全國學術界文化界的作者讀者的利益，有害於整個國家的文化事業。我們更須進一步地明瞭，目前白報紙價格的如此飛漲，亦與這種配額制度有關，因爲絕大部分的白報紙配額都給「既有對象」分去了，所能剩給紙商的數目也就有限，所以紙商在供需不平的情形下，囤積居奇，高抬售價，其結果，使一切不能獲得政府配額的出版業，統受其累。㊟

關於本刊自身，我們亦願在此略述數語。我們過去的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我們在三十六年五月曾一度向中央信託局購紙，請求購買四十噸，公事至七月才批復下來，准購兩噸。中央信託局的紙是日本紙，但須照加拿大紙的市價七折計算。事實上，我們申請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但批准購紙時，市價已超過了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其實際支付的價格，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爲高，而紙質則遠不如市上所購的西報紙。據說最近上海有二十幾家科學期刊聯合向中央信託局購紙，祇批准了一噸，每家祇分到二令左右，我們覺得這簡直是滑稽。我們於加入書業公會後，書業公會在第三季配額時，曾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們因爲書業公會的配額不敷本社實際需要遠甚，故于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雙掛號公函一件致書業公會，正式請求該會派員蒞臨本社，調查本刊的實際需要。我們的掛號信收據是上海第五郵局第 0147 號，並於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收到書業公會的「收件回執」。但迄今一月，書業公會既未接受我們的請求，派員調查，亦未有隻字之答復。我們致函書業公會的態度是誠懇的，而且我們認爲我們這種請求乃是基於一種合作的精神，願意協助書業公會明瞭其會員的實際需要，以作爲該會下次決定配額時的參考。本社現除出版週刊外，並將出版叢書，叢書的原稿且已絡續寄到，本社對於配紙的需要，比以前更爲迫切。我們絕對不能承認，那些色情的書報，在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貢獻更爲重要。那些色情書報都可獲得爲數可觀的配額，爲什麼我們所分得到的獨如此之少！我們對於這種不公允的情形，難於緘默！

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已行一年，現在又是一個年度的開始。我們認爲政府對於過去一年白報紙配額的情形，該應加以調查：究竟過去一年中的白報紙是如何分配的？其實際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書業方面，倒底過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書籍？那些書籍？其用去的紙量與配給的紙量是否相符？我們希望政府加以調查，並公布其調查結果，使一般社會都能明瞭這一方面的實際情形。對於過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應根據調查所得，作進一步的改革。

（十二月三十日）

知識生活的偏向

劉緒貽

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的脫節

任何一個社會裏面，尤其是離開原始生活較遠的社會裏面，都有一羣人，靠獲取、傳授、或運用知識過活；從經濟的觀點看，這便是販賣知識。這種人，我們通常稱為知識階級。事實上，人類的生活行為，除開很少的幾種本能反應以外，大部是學習得來的，裏面都多少包含着知識的運用。比如一個農人，並不是生來便會種田的，因為種田也需要關於播種、加肥、除草、收穫、天候、土壤等知識；愈是要做一個好的農人，需要這一類的知識也愈多。石工木匠，至少也得要懂得如何應用規矩繩墨，做生意要先當學徒，這表明工商行為也是不能與知識絕緣的。不過，這些人的生活行為雖然與知識有關，但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知識的獲取與運用是混雜在一起的；即使有距離，也不會太遠。做生意和做手藝的人，雖有一個當學徒的時間，但他們在此時間所學的知識也同時在應用。第二，這些人的知識都是和生產勞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離開了生產勞動，他們的知識便沒有什麼用處。至於知識階級的生活行為與知識的關係，則與此不同。第一，他們獲取知識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亦即獲取與運用知識之間，有一個很長的距離，所以凡是閒暇少的人都做不到。第二，他們獲取與運用知識的活動，是和生產勞動無關的，至少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一個人變成一個知識份子的過程，便是他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過程。

由於運用知識方式的不同，知識份子可以分成許多類。在舊時代的中國，大約只有做官的和教育的兩種。現在，除了公（包括文武兩種）教人員以外，還有自由職業人員如醫生、律師、藝術家、工程師、新聞記者等。由於職業的分化，各種知識份子對於社會的作用不同，影響不同，此地篇幅有限，暫難詳說。不過無論職業如何分化，他們有一點總是相同的，即如前面所說，培養他們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而他們的工作，又和生產無關，不能，至少不能直接，增加財富。換句話說，他們都是需要社會來養活的人。

尤有進者，根據美國經濟學者凡布倫（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一個知識份子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途程愈遠，身份也便愈高。所以從前中國讀書人的面孔白、吃飯少、指甲長、多愁多病等，俗話稱為「秀氣」，都代表一個人的身份。愈是「秀氣」的人，也便愈為社會上一般人看得起。然而，從另外一方面看，這包括兩層意義。第一，愈是「秀氣」的人，愈是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照顧的力量，因此便得一批人服侍。讀過紅樓夢的人可以算算，服侍賈政和賈寶玉這兩個寶貝的，直接間接一共有多少人？目前也許不容易找出這種極端的例子，但仍然辦公室裏有工友，家裏有廚子、老媽、和車夫等。這又是一大批不生產的人。所以，一個社會裏靠販賣知識的人愈多，不生產的人便加速度的增加；相對的，生產的人與生產物便愈減少。第二，脫離生產勞動而身份又高的人，一定要有些東西來表明他們的身份。於是，他們吃要吃得好些，穿要穿得漂亮些，玩要玩得巧些。生產這些好食物、漂亮衣着、和巧玩具的勞力單位，自然比生產普通食物、衣着、和玩具的勞力單位要多些。所以社會上這種身份高的人愈多，社會的生產負担也便愈重。

既然從生產的立場，知識階級在社會上是一個純粹的負担，所以每一個社會，如果生產的技術不變，其能養活知識階級的數量，亦必有其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這個社會便要出亂子。一方面是生產者，尤其是農民的暴動；一方面是知識階級的分化。在這種分化中，一部份知識份子或者為了鑽不進「既得利益」的那一羣；或者抱着一種悲天憫人的精神，為生產者抱屈；或者兩種緣因都有，於是組成團體，往往與暴動的生產者結合，反抗知識階級中的「既得利益」一羣。這種演變，有時再加上別的色彩，往往是內戰的基本緣因。尤其是中國內戰，更大半淵源於此。如果我們認為內戰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種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完全脫節的社會結構，實在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的間接聯繫

要補救這種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完全脫節所引起的缺陷，不是沒有辦法的。但是這種補救的辦法，並不是要把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直接聯繫起來，因為社會分工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愈是文明的社會，分工愈複雜，愈有必要。只要我們不想恢復原始生活，只要我們不想「率天下而路」，我們便不必企圖勸從

事知識活動的人，同時也去種田、做工、或經商。不過，從事知識活動的人，雖不必同時去種田、做工、或經商，也不必囂去談玄說理，吟風弄月，卻可以做些更有用的事，這便是幫助種田和做工的人去改良種田和做工的方法，以增加生產。這便是自然科學發達以後，西洋和日本一部份知識份子所走的路。這一部份知識份子，也需要長期訓練，也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是他們的活動，通過生產技術的改良，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了起來。我們這裏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舉出例來，說明科學家與工業家等，怎樣用育種、防蟲、防旱、灌溉、運輸、肥料的改良、機械的應用、以及科學管理等等，來幫助農人和工人增加生產。我們只要舉出一個事實，便可以有個整個的概念。北美在白種人沒有去以前，只住着少數印第安人。這些印第安人中，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份是不直接參加生產的。但當時北美沒有一個像樣的文化；全部人民，都度着原始或者近似原始時代的生活。三四世紀以來，白種人把歐洲的科學與技術帶到了這塊地方，而今，這同樣一塊地方，不獨養活了更多更多的人；而且，北美的生活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九四六年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美國約一萬萬四千萬人，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有二千五百二十萬人。相反的，他們的知識活動加多了，全國強迫教育都到了高中的程度，好幾邦更到了兩年畢業的大學。靠獲取與傳授或應用知識為生的人，在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更是有增無已。這都是由於他們的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了的結果。

我們知道，縱然不像凡布倫所說，脫離體力勞動或生產勞動是一種基於人性的傾向，至少也是林頓（Ralph Linton）所謂普遍文化型。因為無論在那一個社會裏面，人們只要能以知識生活來脫離直接生產勞動，都是會如此作的。所以，每一個社會裏面，純消費的知識份子，只要是沒有特別阻礙，總有增加的傾向。不過，如上所說，除非我們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通過生產技術的改良，間接聯繫起來，一個社會擔負知識份子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也就是說，這個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社會知識生活的偏向

從上述觀點來看我們的知識生活，無疑的，兩千年來，我們的知識生活是走了一條偏路。從西漢以來，我們的讀書人便看不起「奇技淫巧」，禁止言「利」。我們只要讀一讀桓寬的鹽鐵論，便可以看出這種偏向的程度。其結果，我們的知識生活完全與生產勞動脫了節，讀書人變成社會上的純粹負担。歷史上，往往到了社會上知識份子達到飽和程度，遇着此路不通時，也有出來補偏救弊的人，如劉晏、王安石、張居正、徐光啓等，但終因勢孤力弱，難挽狂瀾於既倒。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有意無意的覺悟了這種偏向，於是辦新學堂，派留學生，但除了極少數例外，我們想把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的企圖，都僅止於獲取知識這一段，（也許有人以為到了傳授知識這一段，但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們傳授的也只是我們受訓練時獲取的知識，并不是後來自己研究的結果。）沒有再向前走。因此，我們農人以及大多數工人、尤其是農村中手藝工人、的生產方法，仍然留在傳時代，養不活更多的人；也無法提高我們的生活程度。這種偏向的知識生活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民國以來，我們的新教育制度造出了更多更多的知識份子，更多更多純消費的人，這些人都要有個安插的所在，官場中，學校裏，投機場所，容納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做官和投機雖好，當教授雖然還沒有餓死，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一大批人去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起來，官與投機家終是要被清算的，教授也有一天是當不成的。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李孝友

讀了「觀察」三卷十期楊人楩先生的「關於中共往何處去」一文，一方面感到楊先生的若干論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一方面又覺得楊先生所提出的問題須要加以闡發與引申。本來楊先生那封信的目的只是在說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但附帶的談到了自由主義者在目前對於中共應取的態度問題。楊先生說、

「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既不相同，此距離之長度亦因之而不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對中共者……」。綜觀全文，楊先生似乎以傾向後者自居；目前他之所以保留批評者，乃恐被人曲解作爲「幫閒」的工具。本文的目的即在度量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中間的一般距離，並討論在中國此距離是否可以縮短至最小可能。

自由主義是一種人生觀，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態度，因其所處之社會背景與時代背景之不同，其態度與特性因之而異。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無論任何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都是基於個性的自覺和價值和企求個性能得到完美的自由發展爲出發的。所以對於任何抑壓個性的社會制度，自由主義者必挺身反對。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敢於反抗權威的叛逆精神，在整個人類進化史上有著極其輝煌的偉績。古希臘雅典的自由主義者曾兩度反抗貴族與財閥的專制，促成梭倫(Solen)與克利西尼(Clisshenes)先後的改革。中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更揭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兩面光輝的大旗。研究過近世史的人，更可以從洛克、盧梭、伏爾太、潘恩……這一串響亮的名字裏，看出其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

自由主義之淵源甚長，我們不必從希臘詭辯學派(Sophist)主張「人是萬物尺度」的畢達哥拉斯(Protagoras)一一算起，因爲對於後世，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智識份子有深厚廣博的影響的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潮，大體分爲兩派：一是以法國盧梭爲創始者的天賦人權論者，一是以英國亞當斯密斯爲代表的個人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前者激起了波瀾壯闊的近世民主洪流，後者促進了資本主義的進展和成熟。亞當斯密斯的學說，因資本主義的春蠶絲繭與弊端百出而受到了揚棄。但盧梭的天賦人權論至今仍光芒四射，深入人心。

本來整個自由主義的精神是爲了個人人格完美的發展進而追求每個人人格都能完美的發展的打抱不平精神，所以每當一個社會制度僵化，妨礙了多數人生存的時候，自由主義者輒吹起了改革的號角。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可以說是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每一個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恆身爲先驅，與新興的改革勢力站在一起。但到十九世紀的末期及二十世紀以來，共產主義的思潮奔騰澎湃。人們除了要求選票以外，又有要求足夠的麵包的呼聲，使自由主義者開始處於最艱險的局面。

甚麼是共產主義呢？我們不妨用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馬克斯葬埋時所發表的演說作爲最簡短的註譯：『馬克斯發現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人類有了衣食住行以後，纔能對政治發生興趣；這就是說：那種直接維持人類生活的物質生產，是政治制度及法律關係的基礎。』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描寫出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獲取生產工具之後，商品的生產就宣告結束。生產品就不受生產者的操縱，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被有意識的計劃組織所代替。個人競爭生存時代的階段從此即告結束。在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纔得最後脫離了禽獸生存的世界，而進入眞正的人類世界……」但是如何達到這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呢？共產主義宣言上說得明白：殘酷的階級鬥爭與流血革命之後，再繼以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雖說毫無悖於自由主義者的公道正義精神，但對於其手段的粗暴，自由主義者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出身中產階級有著溫飽生活的自由主義者，不能瞭解無產階級，正如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不能瞭解一羣飢寒交迫的囚徒爲甚麼要用暴力衝出牢獄的鐵門一樣。

自由主義者對於一切事物態度，固然是出於個性的自覺，但這種個性的自覺卻具有雙重的特性。一方面具有個人性功利性，一方面又具有社會性與正義性。基於前者，所以自由主義者對於極權主義富於干涉性的共產主義所造成的整個社會的改觀與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不能同意；基於後者，每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目睹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罪惡又不能不對這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一羣，寄以深湛的同情。這時造成一部份自由主義者在「自由」與「平等」的岐途上選擇的徬徨，而另一部份的自由主義者在開始殫精竭慮的探討二者是否有協調的可能。這些自由主義者以「不匱乏的自由」，更具體的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內容，同時努力進行一種抑强扶弱的漸進的階級水平運動。這是世界上整個自由主義者的趨勢；英國工黨的執政便是這種趨勢的最顯明的象徵。同時西歐國家中如法比等的共產黨接受了議會政體，取決於選票的多寡。法共領袖多列士更坦白的說：「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只莫斯科一條」。這似乎是證明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矛盾，有協調之可能。

甚麼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呢？正如以上所述，自由主義是對社會的一種態度，自然隨社會的變遷而易其形態。如果脫離中國空間與時間的背景，未能深刻瞭解中國的社會，而欲論列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的社會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型態(去年賀昌羣教授於大公報上中國政治社會的大矛盾一文中闡述甚詳。)此已爲不爭之論，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使命就是摧毀這個封建的社會，完成一世紀以前法蘭西自由主義者所完成的相同的工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確也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屬於小市民階層與智識份子，但其中堅力量組織比較嚴密的，表

現比較凸出的仍然是青年學生。所以我們不妨將從提出科學與民主的「五四」運動起，到「五二〇」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止這一段的學運，視為自由主義的要求改革現狀反帝反封建的呼聲。三十多年過去了，固然這種運動對社會對文化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本質，以及根深底固的封建勢力却未能動其毫末。這不能說不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自由主義者溫和的甘草二花失效之餘，中國共產黨遂乘機投之以猛烈的虎狼之劑。而這劑「革命」之藥，却已使整個的封建勢力戰慄不已。

在這裏我們不免要檢討以往自由主義者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自由主義者未能伸根於廣大的人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中去；僅僅是斤斤於注意個人的自由，而忽略了多數人的福利。更未能根本瞭解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農民的覺醒與土地的改革。唯有農民覺醒與土地改革後，封建勢力始能無所附麗。土地改革雖然不是摧毀封建社會的充分條件，但是它是必要條件。

目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遭遇雙重的苦惱。一方面受全世界的兩大潮流「自由」「平等」的激盪，一方面中國又有着特殊的國情。歷史所交與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課題有二，一是摧毀封建社會，二是使每個人的個性得到完美的發展。就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來看，這兩個課題中的前一個工作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並非格格不入，但後一個工作則二者見解懸殊，互異其趣。這便是自由主義者苦惱的淵源。楊先生所謂自由主義始終不能接受共產主義是事實，但謂二者無法妥協則似乎未免言之過早。

我所謂之「妥協」是指促使中共造成承認異己尊重異己的民主風度，與發揚個性沖淡黨性的溫和氣氛。但這種「促使」工作的進行是須要真正的和平到來以後。大半出身於中產階級的中共，我相信他們會接受自由主義者善意的批評。每一個自由主義者應當有這種希望，同時也應當有這種信心。如果說僅僅是為了中共對個人自由有「威脅」的可能，而像楊先生所說。「某些自由分子嚷着要消滅中共」，準備與腐朽的封建勢力同流合污，最多也不過使歷史倒退幾十年罷了，但是歷史決不可能倒退的。在目前與其說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始能顯自由主義者的面目，不如說自由主義與封建社會對立更能顯露其特性與使命。雖然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須要對立，但須要在二者共同的「敵人」封建社會摧毀或却步以後，這種對立始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正像楊先生所說，每一個自由主義者無法贊同內戰。因為內戰的本身所造成全民破產的後果，及炮火所刻畫出來的那幅悽慘絕倫的圖畫，使每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不能忍受。雖然一方面為了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由「動員」而「戡亂」，但整個的政治却已病入膏肓，已到非變不可的階段。然而國脈民命，懸於一絲。如果「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誠懇的期望中共的領袖念人民痛苦之日增，及本身幹部因革命而犧牲的慘重，善於運用此一權力，在適當時期，重新回到政協的軌道裏來！當前中國自由主義者所期望於中共的，就是在摧毀中國封建社會的共同工作上，不到最後絕望關頭，不必訴諸武力。

印度的道路（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從八月十五日到現在，印度的獨立不過才四個月。但因為真納的巴基斯坦美夢也於八月十五日實現，異族統治者的撤退在古老佛國劃上了一條新的疆界，一般沒有教族偏見的印度人心裏，獨立的狂歡本來就已經籠罩了一層陰影。不幸接着到來的是東西兩旁遮普省的大屠殺，，繪出一幅歷史上少見的悲壯的流民圖。『人口交換』所牽連到的數字據估計在八百萬人左右！而克什米爾土邦的連天烽火，又將決定着印度和巴基斯坦這一對孿生兄弟的未來關係。這重重的憂患，不惟使得尼赫魯內閣苦心焦慮，無暇喘息，不惟使得有識的印度人對獨立的獲得唏噓慨嘆，就是一個純粹同情印度的外國人士也深深覺得時月悠長，好像從八月十五日到現在並不只四個月。

一個執政多年的政府，我們往往容易加以批判，因為這樣的政府不惟有着未來的計劃和決策，而且還有着過去的一切計劃和決策所表現出來的成績。憑着已有的成績，我們便可以決定；這政府是不是一個有作為的，值得歌頌的政府，或者是不是一個腐敗麻痺，人人得而攻之的政府，但印度政府是這樣年輕，假若我們想要了解得比較深切一點，那我們只有從這政府目前一切決策和計劃的動機上去探尋它未來的途徑。

印度政府是一個國大黨政府。國大黨經過了六十幾年的鬥爭，終於達到了

自由獨立的目的，從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當年他們爲了印度人民大衆的福利向異族統治者所要求的，現在已輪到人民大衆直接向他們要求了；當年他們可以向異族統治者要天上的月亮，現在人民大衆却很實際的向他們要求不再束緊褲帶，不再裸着身體。當年異族統治者拘捕他們下獄，危害他們活動的一切文件，現在却在他們掌握下的案卷里作爲他們鬥爭歷史的驕傲紀錄，提供他們以同一代人而作爲創業者和守成者的警惕。在這種通過痛苦而獲得的喜悅里，他們衷心的感觸和奮發應該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自治領議會

印度自治領議會的第一屆會議已於十二月十三日閉幕，從這次議會的主要活動，我們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一般趨向。這次議會共開會二十一次，結果却順利的通過了比開會次數更多的議案。原因是：隨着自由獨立的獲得，印度領袖們產生了一種新的責任觀念。議會里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反對黨，也使得辯論的進行減少許多阻礙；而且很多議案和修正案都是先在國大黨里經過辯論，通過之後才在議會里提出的。因此，議會里除了極少數的場合外，一般議員都盡力支持政府，盡力避免意見的紛歧。本來國防預算的增加，在以往的議會中一向是辯論的焦點，這次却毫無異議的一致通過，甚至有人要求再增加，直到財政部長說：『政府有着維持强大軍隊的充分財力』時才皆大歡喜。鐵路運輸的加價，在以往也是不容易得到議會通過的，這次的議會却也一致同意提高票價和運費。

反對國防預算增加的人不是議會里的議員，而是甘地。他曾在『哈里眞』週刊上闡述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和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不可混爲一談的一封信里說：「幾十年來，我們的政治家們曾在英國的政權下反對軍備的龐大費用，但現在，政治的自由來到了，我們的軍費却增加了，還有着再增加的趨勢，而我們竟以爲驕傲！在我們的議會里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關於鐵路預算問題，他並沒有表示意見。

糧食政策

在這次議會的各項辯論里，眞有點辯論氣氛的只有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因爲這問題關係着每一個人的切身福利，報紙和羣衆都特別加以注意。糧食部長普拉沙在宣佈這項政策時曾說，這政策的目的是在逐步的取消管制，以至整個的停止一切配給制度。他希望這政策實施後，糧食缺乏的區域價格會降低，糧食過剩的區域價格會上漲，但他希望價格的上漲不會漲到目前黑市價格的程度。又說，假若這計劃萬一失敗，政府還可以厲行更嚴格的管制。至於政府取消管制的原因，第一是管制制度有整個崩潰的危險；第二，政府爲了維持這制度所須付出的費用相當龐大，由國外進口的糧食在國內售賣時，政府須從中補助；第三，取消管制後，希望能以比較現時稍微高一點的價格引出更多的存糧，同時刺激糧食增產。補救的辦法是：政府繼續由國外運進糧食，準備積儲五十萬噸左右的數量，作爲應付緊急之用。政府並將經常舉行會議，調查各省各地糧食情況。目前的管制機構保持不動，以便必要時採用最後的法寶——重新厲行更嚴格的管制。報紙上對這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反對最激烈的是新德里的政治家日報。該報曾接連著論批評，並且嚴重的提出一九四三年加爾各答的災荒作爲警告，說取消管制將造成囤積居奇，刺激一般消費品的價格上漲，消費者的負担和生產者的成本也將跟着增加，而購買力和生產品則將隨着低減，政府也勢必要使得公務人員和工人們的薪津跟得上物價，招致通貨膨脹的惡果。即使最後政府決定恢復管制，那事候的局面已是難於收拾。結果是「目前比較花費的安全可能會被花費更大的不安全來代替。」在自治領議會中，議員夏馬曾批評這新政策是開倒車，因爲目前整個世界都在走向計劃經濟和管制。另一位議員孔日魯則以爲政府的辯護淺薄而幼稚，糧食部長的聲明是自欺和虛僞，他焦慮着這新政策會引起嚴重的危險，給予消費者以極其厲害的打擊。他更直截了當的說，政府取消管制的眞正原因完全是爲了甘地對於這問題的意見。

超然的力量

印度政治生活中有着一個最大特點，那就是，除了政府，政黨和民意以外，還另外有着一種超然的力量——甘地。甘地現在已是印度的國父，但他却不像中國的孫總理，老百姓有甚麼冤屈時，只有跑去「哭靈」。他不管住在甚麼地方，每天傍晚照例舉行一個祈禱大會，祈禱以後照例對聽衆發表一篇談話。國事家常，無所不談。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就是他先在祈禱大會上提到過，以後國大黨全印委員會通過了取消糧食管制的議決案，接着才是政府的決策在議會中正式宣佈。甘地曾在一次祈禱大會上說：「增加生產和民衆方面的自己控制就可以解決糧食問題。」他又表示希望農民仍拿出他們存積的糧食來，希望商人們不要放縱的牟利。他一向是相信人性的美，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着適度的道德標準的。因此，糧食部長普拉沙在議會的糧食辯論中說：「最近幾個月

來，聖雄甘地發出有力的呼聲，反對糧食管制，這就使得管制的繼續比以往更加困難。」他又說明，在過去三十年與甘地的接觸中，他發現了甘地的直覺往往正確可靠，而他自己的智能與邏輯則恰好相反，他希望在取消糧食管制這問題上，甘地的直覺也將會正確可靠。實際上，最近兩年來印度的糧食產量就已經低減，分治以後，重要的農業區域又多在巴基斯坦。將來消費者的受苦程度如何，顯然只有靠商人們的「道德標準」來測量了。

這里有一段插曲。據孟買出版的「閃擊」週刊的政治記者說，普拉沙的繼任國大黨主席和他的準備辭去糧食部長職務是由於他跟內閣中的同僚們對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意見並不一致，他本人覺得取消糧食管制將對印度有極大的害處。至於原任國大黨主席克里巴拉尼的自動辭職，則透露出了國大黨與政府間的關係，該記者說，克氏辭職的原因是由於內閣總理尼赫魯跟副總理巴特爾在許多問題上不跟他商量。這消息是否可靠，難於知道清楚。照常理說，假如印度不是以黨治國，那麼克氏的地位不過是一個政黨首領，內閣總理自無事事跟他商量的必要。不過，克氏還在主席任上時，有一次重要演說中曾經批評現政府的行政效率，並且說：「老百姓現在依然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剝削，就像國旗沒有在新德里升起之前所受的一樣。」這篇演說的確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印象，有人甚至說：「即使這是真的，現在也不是家醜外揚的時候。」因為倫敦星期時報曾經把這一段話加以引用。於此，我們想要知道，國大黨與政府之間到底是保持着甚麼樣的關係呢？新任國大黨主席普拉沙在就任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中，也不會明白的宣佈，局外人自然無從知道。有人曾經試作比較，說前任主席克里巴拉尼爽直的批評政府是一個極端，現在普拉沙可能是另一個極端。倒是國大黨秘書長最近曾對一位記者說：「國大組織與政府兩者是合作的，預料國大黨政府將聽命於國大黨全印委員會。」

克什米爾

在這次議會中，副總理巴特爾曾經宣佈印度與巴基斯坦對於劃分所引起的若干重大問題，尤其是財政問題，已經達成了完全協議，大家都高興這種圓滿的的解決象徵着印巴關係的融洽。但大家也都知道，印巴之間另外還有着若干重大問題須要解決，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克什米爾土邦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將是決定印巴未來關係的真正因素。在原則上說，克什米爾土邦已經加入了印度自治領，而且是經過該邦土王和人民領袖阿布都拉的一致同意。印度政府接受了該邦的加入後，才派遣印度的陸軍和空軍去征討侵入克什米爾的「匪徒」。尼赫魯會經保證過，印度將繼續派兵援助，直到把「匪徒」完全趕出克什米爾為止。克什米爾現在有着兩個對立的政府，一個是克什米爾臨時政府，以阿布都拉為首，代表着進步勢力，效忠於印度自治領。另一個是自由克什米爾政府，以巴基斯坦作後台。因此，一部份人會把克什米爾局勢的性質和將來可能產生的影響比作內戰時代的西班牙。巴基斯坦當局對於「匪徒」的行動一開始就抱着「我不知道」的玄妙態度，但印度政府卻有充分證據，認為「匪徒」們有着巴基斯坦的全力支持。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的不肯甘心，單從巴基斯坦這名詞的起源上就可以看出來。因為 Pakistan 的 K 字就是代表着 Kashmir 的。假若巴基斯坦而不包含克什米爾在內，那就將變成巴依斯坦了。現在，克什米爾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因了氣候關係，似乎將趨於停滯狀態，假若印巴兩政府能夠趁這機會作友好的努力而獲得圓滿解決，那麼局勢的惡化可以希望避免，印巴的未來關係也會有一個更加穩固的基礎。

外交路線

至於印度的外交路線，尼赫魯曾在議會的外交辯論中重新宣佈：印度將不捲入強權政治的漩渦，印度將與美國跟蘇聯同樣保持友好。假若一旦戰爭發生，印度將盡量的避免參戰。但現代的戰爭，要避免參加是很困難的；假若環境逼迫着不能不參戰時，那就只有選擇對於印度有利的一方。在印度領袖中，尼赫魯比別人更負國際聲望者就由於他獨具遠大的國際眼光。也就由於他這種遠大的眼光，印度在分治以後雖然有偏狹的教族主義者一度狂熱活動，想把印度建立成一個印度的國家，但他把這些教族主義者痛加指陳，終於領導着印度平安的渡過了誕生初期的險境。他現在舉着的旗幟是：一個富強康樂，自由民主的印度。他對於印度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表現的獨立作風深為嘉許，他說他們的作風雖然得不到某些集團的歡心，但卻已贏得了許多國家對印度的尊敬與同情。難怪新德里的政治家日報在評論印度外交政策的一篇社論里說：「不管內部的紛亂如何，印度在外交上已向中國作為國際機構中東方領導勢力的地位挑戰了。」同時，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一位印度代表潘尼卡前幾天在新德里公開演講國際局勢，談到中國在聯合國機構中也是握有否決權的國家時，他曾輕描淡寫的說：「根據定義，中國也是一個大國。」當時曾引起聽衆們的一陣哄笑。

——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

論商賈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五

袁方

「貴」與「賤」

孟子說：「錙銖必較，此之謂賤丈夫。」在傳統社會中錙銖必較謀生的商賈，總是佔着很低的地位。可是周禮所描寫出來的社會分層裏，商賈還沒有賤到末流。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這裏所謂旅，就是商賈。就其地位而論，僅在婦功與農夫之上，還在王公士大夫之下。到春秋戰國，商賈的地位，在爲政者的眼光裏，卻降到農工之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興鹽海之利把齊國經濟繁榮起來爭霸的管仲，卻是最先說「士農工商」的價值尺度的人。他建議桓公「成民之事」，把當時四民分爲「士農工商」四等，「勿使雜處。」於是「士」在其首，「商」在其末。「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好像形成我國傳統社會的格局。

周禮所記述的社會分層如果是事實，商賈的地位，在農夫之上。何以管仲把它顛倒過來，落在四民之後？依我看來，與其說是管仲描寫一個新的局面；不如說是他爲了政治的目的，有意要把商賈的地位抑壓下去。這是當時商業發達和政權衝突的原故。

春秋戰國時代，國君都知道商賈於國有利，爭相招攬，使「商賈皆欲出於王之市。」衛文公有通商惠工以興國的舉措。「陶朱公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巨萬。」（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三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居，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倚頓用鹽盬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史記貨殖列傳）正是「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不如倚市門。」商業勃興，商賈的地位，事實上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在蒸蒸日上，甚至可說這是商賈在中國社會史上的黃金時代。

商賈運用他們錙銖必較的手段，累積財富，有時甚至富埒王侯。這是說，他們的經濟實力威脅了原有的社會分層的等次。富埒王侯，進一步將是權傾王侯了。商賈的抬頭也成爲社會結構是否將予改弦更張的問題。若是不把這在分層裏原處於低級的商賈抑下去，就得承認他們的新地位，也就是說要把原來較高的階層，讓出個位置來，給商賈去占據。在這社會結構面臨改造的威脅中，原屬上層的，也是握有權力階層的不能不出來答覆這問題：退讓呢，還是保守？中國這段歷史的答覆是保守，不是退讓。在握有權力的王侯，守住了他們的地位，利用了原有的社會價值的尺度，賤商。把在社會階梯上躍躍欲上的新興財富階級，打擊下去，一直把他們貶到四民之下，連農都不如了。

貴和賤，原是指社會上看得起看不起的分別。「士農工商」的層次是社會價值的尺度。居於末流的商，也是說社會上最看不起的人物。要使社會上看不起商賈，一定得做到沒有人羨慕商賈。商賈是從事交換經濟的人物，在這計較錙銖的過程中他可以逐什一之利而累積財富。如果要做到沒有人羨慕商賈，必須使商賈的財富有所不能買，使他們不能單憑財富就可得到對人們具有引誘的享受和安全，而且還要在社會上另外開出能具有引誘力的路子來。這些另外的路子又要不去威脅原有的權力結構。做不到這些，儘管想賤商。而商還不賤的。換一句說，要商賤，就得把貴賤之別，脫離財富多寡的標準，而把它繫於權力的高下的標準上。如果財富不能買到權力，一個人不能單通過財富去取得享受和安全，財富才不會成爲最有力的引誘，商賈也不易被人看得上眼了。若是在另外的路上，卻能得到更可取得享受和安全的財富時，商賈的地位，就更要相對的降落了。我們傳統社會中的特權階級，就從這些方面入手去抑壓商賈。管仲所安排出來的四民層次，後來竟成爲事實的圖案。

千金之子竟死於市

大家也許會記得陶朱公想利用財富去保障他兒子生命的故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裏說：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少弟。是吾不肖！」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成事后，復歸之以爲信耳。莊生間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

陶朱公在當時不可謂不富，而且曾貴爲卿相。但是他的「貴」的來源是握有政權的王，離開了給他「貴」的王，也就沒有了勢。他固然可以用他的「富」去邀得王者的恩赦，可是赦不赦還在王者，不在「千金」本身。「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誠可以寫出錢能通貴的力量。可是有時錢也無法通貴，而使朱公長男持其弟喪回家。富而不貴，便將受皇權的威脅，談人權保障，與虎謀皮！

在我們的傳統社會裏，何以「富貴」兩字，老是聯在一起，難分難解。委實有它的深厚的意義。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莊子駡孔子道：「搖脣鼓舌，以迷惑天下之主，所以謀封侯富貴者也。」俗話有「功名富貴」等，若是一加仔細的分析，「富貴」在一塊，不是偶然，這裏實在指出我國向來的社會一條眞正的致富之路——由貴而富；不是由富而貴。

正因爲由貴而富，所以齊莞山海之利，秦有鹽鐵之權，漢置鹽鐵官以莞其事，又禁「賈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並且禁他們爲官吏，也不給他們田產，農民只出賦一算，可是商賈與奴隸則出賦算，對於商賈斂財致富，有種種限制的方策，凡獲利最巨的幾種商業如鹽鐵酒，一律收歸國營，於是中產以上的商賈，破產者不知有多少！隨高祖開皇十六年，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不得與於仕伍，「明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此種情形，商人的無法抬頭，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政策的壓制，其實是貴層的安全，不容許富埒王侯的商賈暗中來威脅。不能「退讓」的絕對皇權，怎能再容許子貢之流，「分庭抗禮？」「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因之不是採商鞅的「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就是像秦始皇的徙天下十二萬富戶到咸陽京城免生異端；或積極的加以約束——不得購置田產，錦衣玉食；或消極的加以侮辱——把商賈與遁亡的罪人一體看待。「天無二日，地無二主」，神明的天子既操生殺予奪的大權，殆全然只有把「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的商賈壓下去，使財富不能通貴！

由賤而貴的道路

說到這裏，有人自然會問：爲什麼商賈不去取得「高貴」身份的來源——政治權力？使人們可以由富而貴，做到名符其實的「富貴」次序？商賈的受制於王者，財富成爲權力的報酬，而不成爲權力的根據，究竟是怎麼緣故呢？是不爲？還是不能？這就牽涉到我國社會一條主要攀登貴層的路線。

天子是我國傳統社會裏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可是天子重英豪，特別知道「儒生有益人主」。於是「學而優則仕」，由士而大夫接近眞龍天子，成爲當典。十年寒窗功名富貴，只要一舉成名，似乎就可以享受不盡，荀子說得好：

>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黑白，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大器舉於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儒效篇）

要是商賈攀登貴層，「唯學」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學而優則仕，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才可以脫去原有「錙銖必較」的本色。身份的改變，地位的轉移，豈是輕而易舉的事？士大夫自有其一套生活方式、思想、行爲；商賈的又是另一套。儘管士大夫路上，並不排擠商賈同登王朝；但是商賈要想從這條道路，直上青天，怕是不容易的；何況還有人爲的障礙加以阻擋？好比隋高祖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不得與於仕伍一類的設施，商賈欲想改行入仕，就是難上加難。據說以前有兩位朋友，一貧一富，貧者科舉出身，有功名；富者經商發財。同鄉中有一武舉時常欺侮這位富翁，富翁奈何不得。於是去請教那位科舉出身的老朋友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老朋友建議他捐一筆錢買個官爵，提高地位。果然後來那位武舉不敢再小看他了。可是爵位是買來的，不是正牌，表面上別人不敢再加以白眼，實際上還是暗中受人譏笑。他再去請教老朋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眞正使人心悅誠服的尊敬？朋友告訴他除了下一代讀書中舉外，別無他法，你這輩子可不行了。這雖是傳說，不足爲憑，但是從這裏不難看出，低層的社會份子，抑壓的苦衷。社會分層的追力，看不見也摸不着。富而不貴，買來的官爵，顯不出眞正的威風，裝不出眩耀的門面。

「毆民而歸之農」

賤商的對面是重農。可是賤商和重農却是同一的作用，就是政治壓倒經濟，使皇帝把持住控制人民的大權。中國的皇權一直是建築在農業基礎之上的：而且也祗有在這種農業的基礎上，這類皇權才能維持。商賈的抬頭地主的式微。所以爲了維護這皇權的基礎，商賈不能不加以壓制了。

自「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敎天下」以來，農始終是我們的國本。「壁土植谷曰農」。農業和土是何等直接，何等密切！卽到現在，我國人民還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猶依傍在農業裏謀生。可見我們的生活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從土地上長大的，靠農業養活的，怎能不對土地不對農業發生親密的情誼？詩經上說：「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値得恭敬，對於培養桑梓的鄉土，又如何不油然湧起愛戀之感？加以農業和土地難捨難分，因之農業人口，似乎也有固着鄉土的特性。不要說「父母在，不遠遊，」卽父母已經逝世，也不能輕易地背井離鄉，忘却祖宗墳墓所在的地方。所謂「安土重遷」，就是導源於此。

農業的生活是安土重遷的。大家生於斯，長於斯，朝夕相處，有個共同的本無形的抓在一起。傳統的思想家，特別強調「本」的觀念，所謂葉落歸根。孔子也說「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對於維持世俗人心，都從「本」字出發，這並不是思想家不着邊際的幻想。

這個本字實在就是農業的別名。農業既是國本，本之所在，何能忘恩負義。可是商業的社會是流動的，和農業的特性，針鋒相對。「本末」原是對比的兩端，傳統的社會裏，「本是農，末是商。」農業固着於地，商業脫離土地——這是對敵的局勢，容易產生衝突的情感！

用實際的情形來說本末的衝突，也許較理論的引申，清楚明瞭。春秋戰國時代，在日常生活裏，工商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於是商人階級乘機崛起。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的變遷，表現在『舍本逐末』的上面。舍本逐末，就是改農爲商。人民從土地裏跑出來，斷了根，變爲商賈；可是商賈的天下，不是祖宗的墳墓所在地，家神土主也管制不住他你的行爲，懋遷有無，鷄鳴而起，遍走江湖，其目的在孳孳爲利。「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財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鼂錯看見這些情形，焉不痛心的說：

>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忘農工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貴，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春不得避風

壓，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前漢書卷二，上食貨志上）

這看法是否正確，不加討論。若是從農本上看，商業實係破壞農業安定的因素。要是「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偶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王符潛夫論卷三浮侈篇）諸如此類看法，歷史典籍裏，可謂車載斗量、更僕難數。所以賈誼有「毆民而歸之農」的論調：「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感動帝王，躬耕以勸百性。這不是書生之見，空發議論！

舍本逐末，顯然破壞農業生活的完整和安定。看不起商賈，賤商，不是偶然的事。自秦漢以降，傳流的社會，一貫的重農抑商政策，始終不變，也不是偶然的事。而且並非由於帝王的偏愛，思想家的空想，推本求源，都與農業有關。因爲農民性情樸直，敬畏法令，商君書曰：「屬於農則樸，樸則令」。商賈多奸狡，且其經濟勢力危及人主。不抑商，不足以重農：要重農必須抑商。然後才可以做到「毆民而歸之農，以著於地。」

帝王——大地主

賤商的一個主要原因，固由於不忘本：重農。可是儘管歷代都主張重農抑商，實際怕是農並沒有重，商亦沒抑，結果有如鼂錯所說：「尊農人，農人已貧賤矣，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賤商，我想還要進一步去加以分析，又要涉牽到前面所談過的兩個字：「貴」與「賤」。因爲農夫雖受皇權的保護，可是不貴，依然在賤的領域與商賈同病相憐；比起商賈，實際上還受皇權的壓迫。商賈是流動的，儘管是末業，易於躲閃皇權的威脅；農民的老根深深埋在泥土裏，易遭直接的摧殘。「四時之間，亡日休息，急政暴虐，賦歛不時。」除了挺而走險，揭桿爲旗，那敢和皇權爲敵！

「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崇高無比的天子面前：「士農工商」，本都是一視同仁，一樣沒有保障。富貴的天子可以使他貧賤；貧賤的天子可以使他富貴，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全是皇帝的私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韓愈原道）皇上的基業，「能以馬上得之，卻不能馬上治之。」一定得有人幫同管理；幫君發號司令的人，不能不給他們以「功名富貴。」「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皇權獨占着天下之富，依他的主意，分賞給幫助他獲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臣僕家奴。

荀子在富國篇說：「人君者管分之樞也」。王霸篇解釋分的意義是「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面，帝王實際到是一個全能的大地主。不是嗎？歷來做官的，作家叙的，都稱自己吃的是皇家的俸祿。因之政權何嘗不可看作是地權。「帝」和「地」在事實上相同的。帝王一般的通稱是天子，可是在我們的社會上天與地又是一個不可分離的名詞。這也許由於與農業有密切關係。因爲農業的生產，一方面不能離開地，同時也不能脫離天時。農業的生產，是靠天地的生產——皇天后土。鄉裏人在亂世都希望有「眞龍天子」出現——龍是水，同時也是皇權的象徵。

帝王是大地主，家奴臣僕，不過是皇上的大小聽差。聽差們可以在大地主的私產裏分一杯羹，吃皇家的俸祿。自秦漢以后，仕宦的途徑，或由選舉，或由學校，隋唐至淸，則出於科舉。所以行政全由官僚包辦；官僚幾乎全是地主的產物。士大夫可以說是大地主下的小地主，歷史上的士大夫，不一定全身出地主；可是等到作了士大夫以后，搖身一變，也成爲地主。皇上利用儒生維持自己的天下，書生也依靠皇上維持他們的利益。互相依靠，他們共同的利益是在維持這安定的生產基礎，農業和土地。他們不能容許末業者流：「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這眞是「傷風敗俗，大亂之道。」（前漢書卷九一貨殖列傳）怎能容許舍本逐末的商賈破壞其間的痛癢關係？賤商，歷史的事實，利害的產物！

這種利害關係的結合，商賈難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麽？「學而優則仕」，商賈明知此路十分困難；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白土地是權貴的基業，於是只有把資本投入土地，作爲上跳貴層的橋梁。歷史上商賈兼併農民的現象，異常普遍，這莫不是傳統商改賤入貴的一幕悲劇！在對絕的皇權下，只容許貴而富，不容許富而貴。「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所希望的是「四海澄平」，「萬世基業」。誰要冒天下大不韙來破壞這個大一統的局面，誰要在太上頭上動土，斷子絕孫，誅滅九族！

桑巴特（W. Sombart）有一句名言說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人們由社會權力獲取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們才能由財富取得權力。何以我們傳統的商賈，不能搖身一變，由財富取得權力？打破由貴而富的僵局？絕對的皇權，貴賤的分層，賤商與商賤，也許是其中最爲基本最爲主要的 個原因。財富在權力之下，談什麼保障，發展更是不容易了！

光華出版社

南京西路五九一弄一七八號　電話三零零四九轉二一四室

郵購總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八〇九號

創立二週年紀念舉行特價

自元旦起至一月十日止外埠延長五天郵戳爲憑
特價期內同行現批或定購按特價再打八折

世界經濟地理講座 胡明編著・上卷廿六元・下卷廿四元
本書八十萬言，係二次大戰後中國出版界唯一完備及最新世界地理學專著，爲研究政治經濟史地時事者所必備，出版以來，暢銷全國，近因故缺售三月，各方期望殷切，特趕印千部，發行特價，以享讀者，捷足先得。

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百科全書版・韶華譯・十六元
本書提供了人類一切社會知識寶藏，其卓越價值，早有定評，現四版出書。增加哲學部門，尤爲可貴。

蘇聯歷史教程 胡明譯・七元
我的大學 高爾基著・胡明譯・八元
夜店 高爾基著・胡明譯・四元
軌聲 傅爾曼諾夫著・胡明譯・四元
莫斯科前衛戰 亮之輯譯・四元

上海按六千倍計算

☆☆☆ **特價七折** ☆★★

郵寄掛號二成・航掛三成・多還少補

觀察通信版

蘇北實地視察錄

鄉少

（觀察蘇北通信）秋天過去了，嚴冬正降臨人間。一千幾百萬的蘇北同胞，在國共雙方的軍事行動之下，田園荒蕪，廬舍為墟，就和這時序一樣，正步上大地支冰透土慘裂的隆冬季節了。

假如處於承平的歲月，蘇北自然還算做很好的地方，她雖沒有江南的繁華烟景，但也可稱為「魚米之鄉」。元末的朱（元璋）張（士誠）之戰，清季的洪楊之役，和這次的中日大戰，江南人民，為避兵禍，成千成萬的渡江而北。五百年來，蘇北沒有經過大的屠殺浩劫。士宦之家，歡喜用「江左人文」的春聯，升斗小民則在牆上貼滿了「四季平安，丁財兩旺」論就經濟的報條。總而言之，無生活、社會思想、和人民心理那一方面而言，蘇北是和平的，靜止的，樸質的。

前秋勝利時，全境兩個省轄市，三十三個縣份，除了通、揚、泰、徐四州外，共軍可算完成了一統之局。大規模的國共內戰自去年七月開始，國軍使用了十五萬兵力，到冬天把全部縣市拿到手了。淮陰是共軍華中的首府，並沒有經過大的戰鬥，就給國軍收復了。今年春夏之交，是國軍的鼎盛時期，縣府入境，難民還鄉，靖黃、揚泰、鎮揚、通如、如泰各綫水陸交通，次第恢復，共軍如、泰、泰、靖四縣獨立團，為李天霞的一百師擊垮，泰興縣長張鵬擧，生俘不降而死。國軍在點綫以及附近地帶，總算能夠維持着一個小康之局。

但是這個可喜的局面并沒有維持得多久，人們平安地度過端陽節，略帶憂懼的度過立夏節，憂心忡忡地度過中秋節，今天連綴靖司令部所在的南通城，清剿指揮部所在的興化城，富戶巨商們都忙着搬家了，各地小據點不是自動撤走，就是為共軍一掃而光。過去反共激烈的鄉保長，還鄉團員，現在又祕密的找尋關係，向共軍悔罪自首，要做個「兩面通」了。

政府指示剿共工作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今天無論是軍事，政治，都是建築在流沙上面的，流沙是經不起地層的振動，軍事政治也面臨解體的危機了。

下面是我的綜合性的報導：

「自首自新」

本來，不能拿槍的共方份子，或共方的外圍份子，於去夏大戰的前夕，已經分批集中，北入山東了。遺留下來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燒光了房子我手裏有短槍」（共軍反清鄉歟詞）的硬漢，這就是武裝的「土共」，一種是從來沒有拋頭露面的地下人員。這兩種人是共軍堅持原地鬥爭的骨幹，和一有機緣就成燎原之勢的火種。官紳們雖恨入骨髓，但又不易容易抓得來「自首「自新」的。倒楣的是那批不相干的一羣，譬如曾經跟在共軍後面搖旗吶喊過的，曾經是工會、農會、商會、婦女會的小頭目的，自由職業性質如教師醫生的，甚至什麼也說不上的善良人民。

共軍在蘇北有七年歷史，政府、議會、學校、醫院、銀行、商店：：無不畢具。她又是相信組織運用羣衆的政黨，工農商學，男女老幼，人人都有個必須隸屬的組織，這些組織裏面的組長、幹事、理事、委員：：：便成為官紳抓得來「自首」「自新」的對象。一個鄉鎮公所，關閉着七八十個自首份子，一個區公所，關閉着二三百個自首份子，這是毫不稀奇的事。說起自首手續來，認為麻煩固屬麻煩，認為簡單也極簡單。寫悔過書，具連環保，這不用說，主要的還是所謂「獻槍運動」，一個人起碼要獻一枝步槍。那裏來的槍呢？一兩黃金的代價就算一枝步槍，（法幣下跌，故以黃金代替）「錢到，公事了」，就極其簡單。「錢不到，公事不了」，也就極其麻煩。這種做法，在南通的五六個縣份，已成公開的祕密了。

這筆龐大的「自首財」，眞正用在自衛武裝上面的還不足十分之二三，其餘大部份，或者酌量分配，皆大歡喜。或者「先小人，後君子」，談妥條件。如、泰、兩縣的幾個區就是取用的「二・四・六」制，縣長六成，區長四成，鄉長二成，至於撥出多少來孝敬上司，恩賜僚屬，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了。

自首份子眞是世界上的至可憐至可悲之人，「獻槍」不足可以死，「策反」無功可以死，局勢惡化可以死，國軍吃敗仗可以死，共軍反攻進來以「反動派」論罪可以死，無緣無故被作為內戰英雄們的「祭旗品」可以死；死的方式有槍斃、殺頭、刀剮、拋河、活埋：：應用得最普遍的方式是黑夜裏活埋，人不知，鬼不覺，槍不響，刀不血，極為簡便省力。對上也用不着陳報，假如需要陳報的話，有「失蹤」。「逃跑」，「圖謀暴動，當場格斃」，「情況惡劣，不及提走」：：聽憑主其事者選擇一個最適宜的字眼。古云：「成則五鼎食，敗則五鼎烹」，現在的確應驗了。

目前共軍也聰明起來，不以自首份子為敵了，並且到處展開政治攻勢：「自首不自新，再當新四軍」，「沒有破壞行為，我們決不加罪」，把自首份子捉了去，客客氣氣，殷勤招待一下又放回來。如皋縣屬的周家莊自首份子一百多人，在共軍祕密爆動下，把區公所槍枝繳光，還屠殺地主家屬和政府幹部七十餘人，一方面宣洩自己久被壓抑的憤懣，一方而使共軍信賴，以圖自存。

地方政府駭怕起來，但從沒有想到從「寬大」與「教育」着手，善後的辦法是加倍的壓迫，加倍的慘殺。泰興四區的一個鄉公所，一夜間槍殺了十二個自首份子，天明了，鄉長召集死者家屬談話：「你們過去都是幫奸匪忙的，現在奸匪把你們的人殺了，誰友誰敵，現在總該明白了吧」。事後有人問起縣黨部書記長，書記長說：「殺得有什麼不對？不過鄉長的技巧欠佳，教老百姓容易識破是我們搞的」。

現在局勢危殆，地方當局更加猜忌潑辣，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偵之，部像患着怔忡之症了。靖江的自衛隊長把一個自首的民兵組長砍下了腦袋之後，挖出心來指着罵道：「入娘的！看你現在還能不自新（心）嗎」？殺之愈兇，逃之愈衆，逃之愈衆，殺之愈兇。本來是共產黨的，一聲呼嘯，一「老兵歸隊」（這是共軍發動的運動）。本來不是共產黨的，事勢所趨，「逼上梁山」。說句公平話，共產黨倒應該感謝這批反共英雄，只有他們，才眞能替共產黨製造出有生的力量。

算「算賬」，倒「倒租」，「三　三」章程收田賦

「地方協進會」、「收租委員會」，這是

地主集團的兩大組織，前者是豪紳的衙門，後者是大地主的「花園」，他們帶着自衛隊，延門挨戶的去算「算賬」，倒「倒租」，共產黨的「算賬運動」是追溯到百十年前往事，他們的算「算賬」也是點滴必較，分毫不讓。這些地主們有一個「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的頭腦，以往本來也吃了些共產黨和泥腿子的苦頭，此時不報，更待何時？起初農民還聽到一點中央的寬大政策，信以爲眞，但經過現實的教訓後，觀感便變了。見到地主下鄉，年青的標悍的就成羣結隊的狂奔遠走，弱的懦怯的不及逃走的也成羣結隊的俯伏求饒。「土頑」（共軍稱地主和自衛隊）比「洋頑」（共軍稱國軍和省保安隊）更加不留情的，舉凡食糧、木料、猪隻、鷄鴨……值錢的好吃的東西，一搶精光，對于俯伏求饒的，還客氣一點，對於狂奔遠走的，往往什麼也不留下，連鍋、瓢、碗、盞也用大車裝回據點去了。如皋十三區盧家莊的某大地主懷憤的說：「這班暴狗入的！又可憐，又可厭，我要不是進的「道院」（蘇北迷信組織），看在「老祖」（道院的始祖）的面上，眞要一把火把他們統統燒光的」！

中央和省府的命令，蘇北的田賦，從今年度開徵，以往積欠，一律豁免。命令是堂皇的，一到地方政府的手裏，面目全非，性質全變。有些縣份，擅自訂定了新章程，所謂「田賦三三制」，根據田畝的正產收獲總量，佃農得三分之一，地主得三分之一，政府得三分之一，自耕農得三分之二。有些縣份是派兵跟着地主去收租的，所得米麥，地主得三分之一，鄉公所和自衛隊得三分之一，縣政府得三分之一，這是另一種意義的「三三制」，比前者對佃農客氣點了。今秋蘇北歉收，中等田畝只收到八九斗黃豆，政府和地主閉着眼睛昧着良心估計得多多的，佃農所得，實在不敷種子、肥料、人工和農具的耗費。共軍的糧賦一畝十二市斤，夏季徵麥，秋季徵米，現在不但要徵收秋季的，而且補徵夏季的，她的「武裝工作隊」一直活躍到南通城外，誰還敢不給呢？有些中小據點裏的居民，也偷偷地去繳錢完糧，唯恐共軍打進來了要「清算」「鬥爭」。「化錢求安」，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思想。

老百姓還有一項難以統計的財富損失。六年來，共軍的「江淮銀行」、「華中銀行」、「鹽阜支行」和「蘇中支行」，發出了無數的「抗幣」，僞幣法幣，一度絕跡。現在「抗幣」等於廢紙了。廢紙尙可糊窗子，揩屁股，派一點用處，「抗幣」卽使放在家裏也可能惹起不可測度的禍事，市場的使用當然不必說了。八年的抗戰，耗盡了所有的國民積蓄，透支了未來的國民所得，但是二年的內戰，將遺禍害於我們下一代的子孫了！

清剿工作和軍隊紀律

整個蘇北的清剿工作，劃歸徐州綏署負責的，北部屬彭雪中的清剿指揮部，駐節興化；南部屬李默庵的第一區綏靖司令部，駐節南通，南部同時又受國防部直接指揮。過去南部的清剿軍，是李天霞的一百師，王鐵漢的四十九師。李部備配精良，軍紀較佳，戰鬥力也很強盛。常以精銳營團，編成機動部隊，夜行晝伏，四出游擊，共軍每聞風遠揚。春夏之交的小康局面，得力於李部者最大。後來李調山東，全師覆沒，李本人被押於國防部待審，最近報載已無罪開釋。王亦調東北，蘇北南部的能征慣戰部隊全走掉了。日前南部的綏靖工作，由畢書文二十三師負責，畢師原係郝鵬舉僞軍，日冠投降時，郝部「還軍於民」（投降共軍改稱「民主聯軍」），今春才「還軍於國」，郝死畢繼，調來蘇北。畢部有幾個特點，教人啼笑皆非的。第一，調至如皋泰靖後，立即下令將據點四周的民房限期拆光，時屆隆冬，民無歸所，老幼啼哭，慘不忍睹。第二，據副官處長講，中央對他們岐視頗深，經費從來不及其他的部，因此軍需粮秣，求之地方，稍不如意，自縣區鄉長以下，舉手就打，開口就駡，對於老百姓的態度，更不用提了。第三，平日深居簡出，雖得出動，偶而到附近地方走走，他們自已說是「清鄉」，老百姓私下說是「清箱」，連小孩子的撒尿布也給他們「清」掉了。第四，對於保安隊，自衛隊，甚至自家的部隊，坐看共軍襲擊，雖近在咫尺，從不救援。地方機關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請出來了，打勝仗要慰勞，打敗仗要賠償，共軍事先跑掉沒有接火，說你謊報軍情，要「嚴懲不貸」，而且眞的「嚴懲」了，好多鄉長就被吊起來拷打過。大家都知道二十三師的俗語所說的：「聾子的耳朵——牌子眼」。第五，駐在泰興縣屬黃橋鎮的旅部，不准人家稱過去的「和平軍」爲「僞軍」，也不准人家稱今天的共軍爲「匪軍」，他們自已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件件有分的。北部的情形尤爲糟糕，戰略據點的鹽城，一度失守。現在連淮陰五里內的據點，也給打掉了。李堡，斜角，栟茶……這些南北聯系的要點，前幾天宣告失守。現在整個蘇北是支離破碎，寸寸腸斷。目前共軍管文蔚（軍區司令）鍾期光（行政專員）施亞夫（十二縱隊司令）諸部，正由東臺邊向腹地及沿江地帶滲透，如皋泰州興化諸城遭受圍攻。如皋縣長說：「我眞的要變成以前的兩位嗎」？（如皋第一任縣長就職三日，城陷被俘。第二任縣長尙未進入縣城，即與職員一百餘一齊被俘）泰州縣黨部委員的母親，在家裏唸南無觀世音菩薩，「我家世代忠良，你總要保佑，不要有什麼惡報」，泰興縣政府的機密文件，也搬到兵艦上去了。

四五個團的省保安隊，簡直沒有什麼作用，配備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連士兵的冬衣還沒有發得完全。前一些時候，共軍獨立團進攻黃家市自衛隊，省保安隊與自衛隊的防地僅一衣之隔，坐看自衛隊被共軍解決了。共軍獨立團的政治指導員和碉堡內的保安隊的對話，值得記錄：

「老鄉！對不起得很，打擾你們的睡眠了。我們這次是來找黃家市區長鎮長和自衛隊的，和你們無涉，請老鄉不必過問」。

「同志！你我都是混混的，往日無怨，今日無仇，我們爲啥要管別人家瓦上的霜？但你們總得給我們留上點面子，才好對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我們在兩個鐘頭內不能解決，一定自動撤走，請你們佯裝追擊就是了」。

「就這麼辦。來日方長，見面的時候還多，以後請多多的照顧」。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敝團部玩玩，不妨事。再見」。

共軍開始攻擊了，解決了三個碉堡，鎮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碉堡，區長在頑強的抵抗着。但是兩個鐘點的時間到了，共軍也居然踐約，下令撤走。保安隊看見他們去得遠遠的，從碉堡上跳下來，涉河而追，無目標的亂打了一頓機槍了事。後來保安隊長召集部屬訓話：「一家有父母妻子，誰値得去送條性命？養個人也是千難萬難的，但是誰要把這消息傳開出去，我立即就撤誰的職務」。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回家後依舊造屋置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辭職還鄉和共產黨一拚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悔不刮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聯防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請示機宜回來了，參議員代民請兵，得着一點「口惠」也回來了，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有人眼光遠一點，把希望寄托在白宮身上。

台灣「總有一天」

鄭俠

（觀察台灣通信）

台灣這重歸祖國的海島，如今她已不像人們所憧憬的那樣幸福安適了，她同樣受着內戰的感染與影響。她既不再是魯濱遜偶遇的孤島，也不復是陶公夢幻的世外桃源。

物價驅匯率　災害祈鬼神

從光復到現在兩年間，物價飛躍上騰，迫得每個人都喘不過氣來。據官方統計，上月的物價指數是百分之七〇八五四．七。顯要們為應付物價，穩定金融，想用台幣匯率政策得到些效果，從最初的一比二十（台幣比法幣）而提高到三十五，四十八，五十七，七十二，七十九，最近已再提高到一比八十四了。這種並非由於本身經濟安定所表現於貨幣價值之相對增加，不但沒有控制了物價，反而使物價驅策着匯率。而且每當匯率變更必然刺激物價上漲，這從現在限制高匯到停止商舖利用高於法定比率套取法幣頭寸上，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日人心目中的「寶島」，如今正進行着飢餓癱瘓的不治之症。日本人在這裏是百廢俱興，到了中國政府卻是百業俱廢；一切只靠通貨膨脹過日子。日本人留給我們的工廠礦床共有一萬多所，現在勉強可以冒烟的不過半數，其餘大都死停在那裏，讓機器銹得發臭。成千萬的工人，盡被無情的趕出廠門，變為失業後備軍。根據台灣地政統計記載，日治時期（民三十三年）工業人口共三十一萬五千人，佔全省職業人口百分之一二．六，礦業人口五萬餘，佔百分之二；我們來了之後，卅五年年底的統計，工業人口只佔百分之三．〇八，實數僅有十二萬人。礦業人口只佔百分之〇．五五，實計二萬一千人。工礦業人口的銳減，將近百分之十一，職業人口的減少便是失業人口的增加。在農業方面同樣遭到極大的浩劫，由於今年八月一次可怕的颱風和最近羅東暴雨，數萬畝的良田都逐水東流，損失慘重，難以數計。像這樣的災害在日治時代並非絕無，但他們並不坐以待斃，每年都防治修建，不遺餘力。現在不但沒有修建，而且讓原來僅有的也不能保存。不但沒有克服自然，而且將被自然征服，人們在不斷的災害襲擊下，已慢慢走近飢餓死亡的邊沿。我在台東親眼看到很多農田水利的建設與道路橋樑河防工程，盡都遭到颱風暴雨的重大破壞。我曾經問當地居民從前的情形，他們說每年都有颱風給的災害，但日治時期不到一月便可以修復。我們政府則一個月兩個月……到現在快半年了，簡直沒有修復的可能。老百姓在絕望中只有求諸於神鬼，每當颱雨暴風之際，便焚香燒紙，向冥冥中的上帝求饒，而房屋田園在啼號的祭浪中盡被滾滾的暴洪捲去了。

戡亂與建國　選災與食糖

政府戡亂聲的浪，在這裏也是高唱入雲。不論城市鄉村，到處可以瞻仰新鮮的標語口號，由抗戰而戡亂，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盤，的確是件大事。「節約勘亂」，「勘亂救國」，「勘亂必勝，建國必成」，這對於我們內地人並不新穎，因為與抗戰時期不同的只是幾字之別，但對於台灣同胞確是一個最新奇的傑作。他們所奇的是，抗戰已經勝利為什麼還要「勘亂必勝」？台灣無亂可勘，建國也並沒看到一點影子，相反的台灣原有的建設現在卻慢慢給破壞完了。

進行大選，實施憲政，也是當今政府竭力標榜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台灣表面上看好像也很熱鬧，所有的報紙都在給候選人鼓吹，街頭巷尾，飯店茶室，幾乎每一個角落里，沒有一個地方不貼着大幅的宣傳廣告，藉以逗引選民。但祗要注意他們的履歷時，全篇一律的都是日治時代曾任某某顯貴，現任某某要職。好像唱戲一樣，上次扮演秦檜，下次也可粉墨曹操，只是改頭換面而已。鑼鼓盡管打得雷震，噪音盡管喊得響亮，但總引不起人們的興趣。無人捧場已經夠丟臉了，最使人嘔心的他還要硬請你捧場。前天竟有人跑到辦公室來，奉我們上官之命，讓我們推薦候選人××，每張身份證都要集在一起。在末投票前，「為防止選民棄權計，凡不投票者，不予配給食糖」。（新生報豐原訊）如果不投票，甚至可能飯都不讓你吃，這便是大選前夕的佳音。而今選舉完畢，僅以台北市而言，市民共有三十多萬人，而投票的只有九萬人，據說其餘的二十多萬人都沒有投票權，這也是所謂「普選」。

「總有一天」

台灣同胞受日人教育前後五十多年，光復後正需要努力掃除過去的毒素，灌輸些新的血輪。但事實上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兩年來學校裏的課本仍然還是從前的內容，我曾經親自到過很多學校去參觀，他們用的外國地理上，朝鮮、台灣還是屬於日本的領土。這樣真是天大的笑話。我在台東時曾經去參觀該縣最好的一個「文化小學」，一個敎員親自告訴我，有一次他問學生中國和日本那個強，出乎意料的回答是「日本強」。再問，日本強為什麼被中國打倒的？學生說「日本不是中國打倒的，是美國打倒的」。日本雖不是中國單獨把她打倒的，但學生的觀念顯然也是錯誤的，怪不得那位先生慨嘆「兩年來的心血盡化雲烟」了。但是教育不是關起門來講壇的，社會環境與實在的生活才是最強有力的教育，如果說這是教育的失敗，毋寧說是政治腐敗的結果。

台灣這個日治時代的寶島，「經過兩年之後，由於惡劣的管理及殘忍，已迫使友善的人民從事初步的叛亂」。（華盛頓二十一日電載十一月廿四日大公報）如今表面上看似乎很平靜，而裏面卻潛伏着危機，台胞並沒有因鎮刺而忘掉飢餓，他們內在的怒火一天一天的增加。他們認為他們是在「革命」。他們上次是失敗了，現在則普遍地流行着一句話是「總有一天……」，這句話使人值得深思。

十一月廿六日於台北

敬謝讀者感情

編者先生：物價狂漲至此，殆非一般民營刊物所能担負，貴刊是我們所歡迎的僅有的刊物之一，我們實不忍聽其因受物價的壓迫致遭摧殘。在此時期只要貴刊表示願意接受讀者的援助，我想大家雖然一樣的貧苦，必皆樂於竭盡綿薄的。希望貴刊務即作此攷慮。

葛保龍　謹上　十二、十七，福州

編者按：葛先生的盛意，我們非常感謝，我們仍在撐持中，至少目前尚未到要向讀者呼籲捐款的程度。餘見三卷十一期編者復陸樹人先生一函。謝謝葛先生。

退稿附郵

讀者惠稿，不用如須退還者，務請于寄稿時附貼足退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余友才

簡歷：浙江吳興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生。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東吳大學文學士。九年（一九二〇）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九年至十五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前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心理學教授兼系主任。十五年以後，歷任燕京大學心理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代理校長職。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以後，代行燕京大學校長職務。現年五十四歲。

上

十九世紀德國心理學大師艾賓浩師（Ebbinghaus）第一個應用統計分析和數學的方法，從事關於記憶的研究。一八八五年，他發表了一篇實驗報告。說在剛剛背熟一些，無意義的字（Nonsense Syllable）之後的二十分鐘，會忘記得特別快。再過四十分鐘，所忘記的會超過所背熟的一半。到二十四小時，則所能記憶的就沒有多少了。這事實，在他那轟動一時的「遺忘的曲線」（The Curve of forgetting）上表現得十分清楚。本來，人底記憶是一種神祕的經驗。在他以前，沒有人加以實驗。所以，他底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實驗心理學界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早年的陸志韋先生就是承繼着艾賓浩底研究的。一九二二年，他發表的那篇「記憶保存的條件」（The Conditions of Retention）曾經獲得了美國心理學家底注意和讚譽。同樣地，他底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實驗心理學界也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陸志韋先生實驗的對象有兩組。一組包括一個芝加哥大學心理系的教師，三個畢業學生和六個中國留學生。實驗這一組的時間是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到八月。另外一組包括一個教授，六個畢業學生和三個中國留學生。時間是從一九一九年十月到一九二〇年二月。材料也是些無意義的字。分成若干組（每組十二個字）。他所要解答的問題，就是要看在不同的條件之下，那條「保存的曲線」（The Curve of Retention），也就是那條「遺忘的曲線」，的性質怎樣？不同的條件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實驗的方法的。他所用的方法一共可以分做兩組。一組是預期的方法（Anticipation）和重習的方法(Relearning)。預期的方法就是當被實驗者背熟了若干組字之後，實驗者把每一組字，按原來的秩序，那麼一個個地顯現出來。叫他在每一個字出現之前兩秒鐘，先說是甚麼字，說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而重習的方法，就是在第一次記錄作好之後，實驗者把每一組字顯現若干次，讓他溫習幾遍，然後重新實驗。另外一組是默寫的方法（Written Reproduction），重認的方法（Recognition）和重整的方法（Reconstruction）。默寫的方法就是叫被實驗者在一分鐘之內，把一組字默寫出來，默寫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重認的方法，就是叫他在九十秒鐘之內，從二十四個字裏挑選出原來的一組字來，挑選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而重整的方法，就是把一組字分開寫在十二張條紙上，同時把它們之間的秩序搞亂，叫他把原來的秩序整理一番，整理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另外一方面是關於學習的程度的。他分了四種不同的程度。一是百分之一百五十。一是百分之一百。一是百分之六十七。一是百分之三十三。比如說，如果被實驗者讀十遍是百分之百的學習的話，則百分之一百五十是讀了十五遍。百分之六十七是讀了六七遍。百分之三十三是讀了三四遍。

陸志韋先生底結論，關於改變實驗方法的部份，重習法和其他四種方法不同，在最初一小時忘記得非常快，從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也相當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七十四，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五，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重認法從最初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得倒慢：從四小時到二十四小時忘記得反而十分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九十八，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九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二。重整法從最初二十分鐘到一小時忘記得倒慢，從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得反而十分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九十，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八十九，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默寫法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八十八，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預期法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七，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九，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八，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四。關於改變學習程度的部份，用默寫法實驗「百分之一百五十」，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八一．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八．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〇．八，實驗「百分之一百」，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四．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五．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〇．二，實驗「百分之六七」，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五．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一．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四．八，實驗「百分之三十三」，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四十二．七，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二，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三．七。用重整法實驗「百分之一百五十」，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九〇．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三．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九．九，實驗「百分之一百」、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七十四．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八．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四，實驗「百分之六十七」，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五，三，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六．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一．八，實驗「百分之三十三」，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四十八．一，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從這裏，可以知道學習的程度愈深，所保留的也愈多。不過有一個限度，就是過份的學習，比恰到好處的學習，在經過長時期之後，所保留的反而要少。比如「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學習程度和「百分一百」的學習程度就是一個例子。

× × ×

一九〇五年，法國心理學家比納(Binet)對六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每一歲挑選了若干問題，開始了一項關於智力測驗的調查。一九〇八年，他編製了法國的兒童個人智力測驗表，測驗的問題一共有三十二類。

一九一六年，美國士丹佛大學(Stanford)心理學教

授特爾曼（Terman）根據比納底測驗表，重新編製了美國比納西蒙智力測驗表（Stanford Revision of the Binet-Simon Scale），問題一共有九十類。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陸志韋先生根據比納底測驗表，也重新編製了中國比納西蒙智力測驗表，測驗的問題一共有六十五類。在中國教育心理界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那時候，他在南京，所以與北方的心理學家張耀翔先生遙遙相對。「中國比納西蒙智力測驗」雖然小有缺憾，但已經被他底高足吳天敏女士先後兩次訂正過了。到現在，他底測驗，在中國兒童個人智力方面，還是獨一無二的量表。測驗的內容和方法已經變成了常識。這兒無庸多加介紹。

× × ×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夏，陸志韋先生再度赴美，學習關於動物腦部開刀的手術。因為他想從事思想的研究。但回國後，蘆溝橋事變跟着發生了，所以他底研究無從着手。他只好研究漢字改革和聲韻學的問題。到現在，他底研究已經有了結論。關於簡化漢字的路，在他說來，是行不通的。為了解脫漢字對思想的束縛，為了減輕經濟文化上負担，他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文字上的澈底革命。再有一年功夫，他底研究報告大概就可以問世了。

下

在燕園，陸志韋先生常騎自行車代步。他身材細高，臉色有點兒黧黑，戴着眼鏡，可是眼鏡又常在手裏拿着。同時他是一位樸實的學人，生活刻苦，幾年來沒穿西服。同時他是一位忠厚的長者，對人沒有虛僞。每天，他除去在貝公樓裏辦公之外，還兼着國文系和心理系的課務。他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進燕園的。到現在，他服務燕京整整二十一年了。他下年度休假，決定在燕園專心著述。

陸志韋先生從小經過了生活的磨煉，養成了獨立開創的意志。他底父親，他現在回憶起來，是一個厚道而寬大的人。他底家庭，本來也是那麼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後來漸漸地沒落，漸漸地衰頹了。

陸志韋先生最初對莊子的「神祕經驗」有興趣。所以到美國之後，他決定學習宗教心理學。不過那時候，他是沒有一點兒關於心理學方面的知識的。所以他只好先從生理心理學入門，希望給宗教心理學打下一個穩固的基礎。後來，那大概是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他想從事思想的研究。還研究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要看人底思想和語言的關係。要看人底思想怎麼樣影響他說的話。他說的話又怎麼樣影響他底思想。另外一方面要看動物怎麼樣可以簡單地表達一點兒思想。因為這，他再度赴美，學習關於動物腦部開刀的手術。不過因為時局的關係，他底研究無從開始。這不但是他個人底一個大損失。同時，這也是中外心理學界的一個大損失。

陸志韋先生天資極高，興趣極廣。過去，他對文學、哲學，和神學都有研究。不過後來，他專以實驗心理學為體，以教育心理學為用。現在，他以漢字聲韻為研究的範圍。以社會心理為教學的範圍。以教育心理為應用的範圍。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建國教育」發表了一篇「中國心理學最近的將來」的文章，曾經以桑戴克（Thorndike）自勉。實在，要是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他底成就的確不可限量。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陸志韋先生發起北平心理學家聚餐，每月一次，歷年不斷。之後，他又邀周先庚先生和孫國華先生合辦心理學報。另外，他們又同心協力籌劃心理學會的組織。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正月，中國心理學會正式在北平成立。

陸志韋先生也是一個富於風趣的人，他愛收藏古畫。特別明朝的古畫收藏得最多。同時，他也歡喜集郵。

抗戰後，陸志韋先生苦長燕京，對淪陷區域有志氣的青年，他給保存了一塊乾淨的土地。但跟着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解散，他和司徒雷登先生一些人被日本人送進了集中營。後來，他又給轉押進了陸軍監獄。這其中，他受盡了日本憲兵底虐待與苦刑。一年後，在猙獰的「日支」親善的假面具下，他又給放出來了。由於日本人底嚴密的聯保組織和經常的監視，他只能一直留在北平。還以後的幾年，他完全是靠他那些名貴珍奇的郵票維持生活的。這堅忍的高風亮節，在當時那種烏煙瘴氣的敵僞時代，實在難能。

燕大生活在苦難裏。陸志韋先生也生活在苦難裏。不久的過去，他把他在南京的最後一幢房產賣了。現在，他就靠賣房產的錢貼補一家的生活費用。

（上接二頁）鍋灶、針線、犂鈀實際只是燒飯、成衣、種田所用的一種工具而已，這種工具絕對不能稱為他們的『工作母機』，毫沒有『母』的意義在裏面。

（二）關於幾個名詞的中文譯名：(a) Turret Lathe在國內已通用「六角車床」，史先生譯作「砲塔車床」，那是日本譯名，吾國很少用。(b) Speed Lothe史先生譯為「高速車床」，應該是「多軸車床」。(c) Plastic一詞，在某期的大公報工業週刊上討論過，應譯為「塑膠」或「塑料」，史先生用的「玻璃」兩字是一般人的口頭語，毫無工程上的意義。

陳家徵 十二月廿四日 台灣台中

沒有錢結婚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汽車駕駛兵，小學都未讀完（差一學期），可是關於國際和國內局勢的演變，無時不在關心，最低限度我總得閱讀一種刊物或報紙，所以我便由多種刊物中選擇了「觀察」，尤其是「觀察通信」我最愛讀，關於軍事的剖解我更是百讀不厭。先生屢次的說：「觀察」是一種高級刊物，可是我這個低級的人每期總是非買不可（從前上城時才買一本，自三卷四期起每期都買了），固然有許多論文我是看不懂的。軍隊免不了要移動，所以從未訂閱，零購則多付百分之五十的代價。

下邊說一些關於婚姻的事情。內戰在無限期的進行着，那麼婚姻問題便成了大多數青年男子的嚴重問題（貴刊還未討論過）。為什麼呢？旁的地方不得而知，在陝西有些地方定婚，女家要六七十綑棉花（每綑十斤），合市價要兩仟多萬元。如沒有這些棉花拿出來，那麼祇有聽天由命了。

國家優待技術人才，上士駕駛兵每月八十萬元，如果一文錢不花（鞋、襪、手巾、肥皂、牙粉、烟捲都不買，新聞紙也不訂），準備結婚還得準備上兩年多。如果顧慮到父母的生活（父母的生活豈能不顧慮呢），那麼就是到四五十歲還是結不起婚。（一輩子沒有結婚的實在不少數，俗語有「剩男」而無「剩女」）。養家已成為青年男子很普遍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在晉南（讀者是晉南人），訂婚也要一二十石麥子（每石一百四十斤）。這大概是普遍的現象，不是三省兩省的問題。

這不是開玩笑，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請政府能夠注意這個問題，設法幫助使結不起婚的人能夠結得起婚。

侯玉文 十二月三日 西府

觀察文摘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

原作者：朱光潛
原刊處：獨立評論社社論

顧名思義，自由份子不屬於一個政黨。惟其如此，他無須與任何政黨立於反對的地位。黨與黨反對，而自由份子在中間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底態度。他不參加一個政黨，有時因為他要專心致志於他的特殊職業，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黨的活動；有時也因為他覺得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黨與黨的紛爭之中，一部份人如果能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底態度，那對於國家社會有健康底影響。自由份子可能缺乏政治興趣，但是生在近代國家社會中，大部份生活都要牽連到政治，不由得他不對政治作思考和形成意見。他在思考時只須就事論事，無須為庇護某一條黨綱或某一種政策而去對某一件事情作偏袒底贊助或抨擊，所以他的意見往往較能從四方八面着眼，大公無私，穩健純正。如果像他這樣人能在一個社會裏形成一個輿論，那輿論也必是平正底，健全底，有助於社會安定底。

在定義上自由份子既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份子，他就不能有所謂「組織」。一切組織都要有一個共同底信仰與共同底紀律，每個份子都要犧牲個人的自由來保持團體的完整；這信仰與紀律可能與另一組織的信仰與紀律相衝突，個別份子勢必放棄他的個人的立場而為團體鬥爭。這就是「阿其所好」，「黨同伐異」；這也就與自由份子之所以為自由份子底精神相反。但是自由份子雖無組織，他們的思想卻有一個重心與共同傾向。因為實際上自由份子在社會上往往佔多數，尤其是在目前底中國，而這多數人的立場既同是中立底超然底，他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自然是很客觀地就國家全局着想，他們所見到底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黨是黨非。所以在像中國這樣國家裏，眞正能代表民意底是自由份子。自由份子的思想既然比較穩健純正而又富於代表性，它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就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底保持平衡底力量。

因為這個道理，站在任何一個政黨的立場，我們不應仇視自由份子。自由份子本不與任何政黨對敵，而且任何政黨如果在某個主張或某個措施上是對底，值得同情底，就在那個主張或措施上，自由份子必定成為他們的熱心贊助底朋友。自由份子總是站在全體人民的福利一邊，所以總是以公正底態度贊助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那個政黨。自由份子是否贊助，就成為測量一個政黨力量的最準確底標準。一個政黨看到自由份子贊助它，它可以增加自信，提高勇氣；看到自由份子不同情它，它也就該深自警惕，力圖革新。所以自由份子是政黨的清化劑。還不僅此，政黨向來有在朝在野之分，在野黨與在朝黨總是反對底，所以不免常起衝突，這衝突有時惡化到引起內亂底地步。在民主國家，解決衝突的辦法是解散國會，訴諸選舉，或是在朝黨退讓下野，由在野黨重新組織政府。在一個不大穩定底國家，無論取哪一種辦法，都足以引起社會的騷動。如果自由份子有力量，他們的意見就可以在這衝突兩方中保持一種平衡，居中調處，找出一個折衷底方案，不致弄成僵局。所以自由份子是政黨衝突中一種緩衝。與這一點相關底是黨以內可否有自由份子的問題。本來「黨員」與「自由份子」是互相矛盾底名詞。尤其是過去納粹與法西斯那種集權式底政黨。紀律高於一切，入了黨就斷送了個人的自由。不過一個民主式底政黨卻不同，它的力量不在鐵枷似底紀律而在它對於大多數人民底代表性。它應該能代表各種不同底人民的不同底利益與意見，所以它的份子不應該是清一色，或是像古羅馬的「密陣軍」，應該是各種色彩俱備，尤其應該有一部分比較自由或開明底人物。這種人可以成為黨以內底緩衝。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我們更不應仇視自由份子。這一層無用多說，上文所說底話都可以看成這句結論的理由。自由份子在必要時可以反對政府的某種政策或某種行為，在任何時都決不會反對國家。他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當然會贊助眞正為國家謀利益底政府；到了政府不能盡政府的應盡底職責時，他像任何一個有理性底公民一樣，要加以指摘甚至於表示怨望，但是他的動機總是純正底，善意底。他既代表社會上一種健全底穩定底力量，一個賢明底政府不但不應該設法消除他，而且還應該竭力維護他的存在。

在今日中國，自由份子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呢？他被擠在夾縫裏，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政治上一個難能可貴底德行是容忍，而在今日中國的政黨，容忍是談不到底。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敵，既是我的仇敵，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這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一致底看法，他們對於自由份子都覺得是眼中釘，時時刻刻想把它拔去，拔的辦法不是軟底就是硬底。軟底是利誘，假以名位，施以棒喝，使他「入吾彀中」；硬底是威迫，箝制他的言論和行動，假故施以陷害，嗾使蝦兵蟹將去咬去罵，逼得他動彈不得。「此輩淸流，投諸濁流！」這個處置自由份子底狠毒底辦法不圖復用於今日。

自由份子的勢力在今日中國幾乎被剝削完了。他們大部分散在文化教育界與實業界，本應該是社會上底中堅人物，而他們「實逼處此」，不能在地方事業上發生影響，不能在國家政治上發生影響，也不能在教育文化上發生影響。比如說最近這次選舉，一個臨時雜湊意在獵取一官半職底「政」黨，黨員不過數十百人，可以提名選舉到幾百名代表，其中幾乎沒有一個社會知名底，而社會上許多眞正有學識有才幹有聲望底人物就無人過問，他們的唯一罪過是不屬於任何黨派，不能討價還價。固然也有所謂「社會賢達」一類，他們是否盡是賢達姑不必問，即使名副其實，那也就眞是鳳毛麟角，數目少得可憐。

這種剝削自由份子的辦法，就在野黨而言，是所見不廣；就在朝黨而言，實無異於自失人心。彼此都是把可能底朋友驅遣到仇敵的旗幟之下。這樣一來，社會上就只有兩種對峙底相反的力量，沒有一個緩衝底保持平衡底因素，結果就只能有衝突，而衝突還是無結果，因為我們無法希望有一個較高一層底綜合或調和。在一般民主國家，最後底裁判者是民意；在中國誰知道民意到什麼時候纔有能力與興趣去行使這種最後底裁判？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於五十年底未來，中國眞正底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底自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份人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這是一個嚴重底問題，值得各方人士鄭重考慮一番。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區字第一一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七千元